

浙江海洋文化研究丛书

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

Ming qing yilai 政策变迁研究 *zhejiang haiyang yuye fazhan yu zhengce bianqian yanjiu*

白 斌◎著



海洋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课题“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12JDHY01YB)最终成果

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 与政策变迁研究

白 斌 著

海洋出版社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白斌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27 - 9080 - 6

I. ①明… II. ①白… III. ①海洋渔业 - 渔业政策 - 研究 - 浙江省 - 明清时代 IV. ①F326.4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2870 号

责任编辑:钱晓彬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7.75

字数:345 千字 定价:78.00 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一

放在案头的白斌先生《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的文稿已近一月。这是他在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由我负责“指导”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经过修改、完善,准备付印。他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感到有些茫然。学生出书,请老师写序,当感荣幸;但于海洋史,纯然外行,何以下笔?所以茫然。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师生相交常求的境界,列门墙、开学派随之而来,为学界为瞩目。大师有此宏规巨制,学生搬砖添瓦,精雕细凿,日积月累,代代相承,在学术界、思想史遂独树一帜,令人景仰。我没有这样的大志,也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所以,研究生入学之后,我对于选题的态度是,研究生应该独立经历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研究过程,这样才能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因此,总是要求研究生自己选择课题,导师只就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对研究生的研究过程进行一些辅导,提些建议或问疑质难。如果研究生的课题不在导师熟悉的领域范围,也不强求“入我范围”。只要研究路径规范大体正确,选题可依各自兴趣擅长,青不必出于蓝,“万紫千红”也是一番气象。白斌著作的内容,就是在我“范围”之外的一个选题。也是因为学生们的“万紫千红”,不断地拓宽了我的历史视野,让我不断地走向“茫然”的未知世界。“老师”只是一个名义,“学生”才是我的本然。

黄河、长江,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是东亚地区的“两河文明”。但是,中国大陆,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海岸线之外,是浩瀚无垠的黄海、东海、南海,通向太平洋、印度洋。黄河、长江



与大海大洋的“水乳交融”，延伸出另一个奇异的“海洋中国”。远古时代贝币的使用，虽然早已是华夏族渔业与农业物资交换的媒介，但是，蓝色的大海，依然是在黑土地、黄土地上辛勤耕作人们的神秘仙境。渔盐之利、仙境探求，推动着人们不断地走向深蓝。元代开海运，是中国沿海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到明清时代，终于促成了“海洋中国”的蓬勃兴起，不在专制王朝的“体制”之内，却是中国全景的一个组成部分。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海上生产、生存和交流能力长期积累的一个明证。明代中叶，闽粤海商已经在环中国海建立起了庞大的渔业、商业“帝国”，与内陆封闭的农业社会频起冲突。明代所谓“倭患”的平定，到清代郑氏台湾政权的最后归降，勾勒出了我们所知道、所不知道的这个神秘的“海上中国”的兴亡历史。在中国浩繁的史籍中，我们缺少一部海上中国史。

中华文明没有像江河一样奔流入海，而是将大海收归江河之中，这是农耕文明的一次历史性胜利，却是“逆流而行”的历史性错误。所以，在接踵而来的以海洋为国基的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曾经有过的历史性胜利，迫使中华民族付出在海上一连串失败和香港岛、台湾岛被割让的惨痛代价，从当今“第一岛链”的困扰以及钓鱼岛、南海诸岛的主权之争，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当年“海洋中国”在沉沦中悲愤呐喊的回声。

白斌的论著，放在这个历史框架内，描述的恰恰是“内陆中国”在取得“历史性胜利”之后不断“收编”“海洋中国”的一段辛秘。白斌出生、成长在西北，宁波大学的求学经历，让他对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浙江的“海洋社会”也就成了他孜孜以求的学问。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海军以舟山为基地，垂涎着中国大陆；以舟山为中心的浙江“海洋社会”的近世变迁，也是我们观察明清两代海洋政策的一个很好视角。在专制王朝和民国政府蝇营狗苟治服海洋社会的一系列政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社会的衰落和挣扎，面对日本“开拓万里之波涛”的无奈和退让。“收编”的成功背后，继续着西风东来以后历史性的惨

败。如何继承维护“海洋中国”的历史遗产,借鉴明清两代海洋治理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值得掩卷长思。这段曾经被边缘、被忽略、被遗忘的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清晰、沉重地融入当今中国历史学的视野,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周育民

2014年11月于海上绿茵苑

序 二

海洋渔业是海洋和海洋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涉及海洋捕捞、船舶航海、内外商贸和渔业政策、渔业组织等诸多问题。自古以来,主要面向大陆的中国,对于海洋问题,尤其是海洋渔业,缺乏应有的关注,以至造成资料记载积累的缺失,相关研究或零散片段,或深度不足,不少仍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大大增加了今天学界研究的难度。

白斌博士自本科毕业以来,长期关注从事海交史和海洋经济文化的研究,而今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著成出版《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一书。众所周知,浙江是中国的海洋大省,江浙地区从宋代开始就已执全国经济文化发展之牛耳,而从明代前中期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又进入大航海和经济文化加速发展的新时代,江浙地区也随之成为我国西学东渐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区域,再加上浙江又有全国著名的舟山渔场,集聚了这众多的时空要素,无疑使此项研究具有很高的立意。

为解决资料零散缺失和之前的不足,作者长期甘坐板凳,潜心发掘整理古今中外各类资料,借鉴参考前人和当今学界的各种成果,博采众长,从而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提出众多新的见解,填补了之前留下的空白,达到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水平。

比如,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提出“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生成受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与传统的影响,是不同社会群体相互博弈的结果。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生成及其在一定范围内的执行会导致外生与内生因素的变化。这一变化在达到一定临界点就会推动渔业政策的演进,但在此之前政策保持一种稳定性与自我适应性。”

作者将浙江海洋渔业政策作为全书研究的重心,首先提出 500 余年间政策生成演进的具体路径,指出“明朝中期以前,海洋渔业政策是内化在海洋政策之中,作为海禁政策的一部分被地方政府所执行。这一时期之后,单独的海洋渔业法规开始出现。而政府则一反历朝对海洋渔民及渔业经济发展放任的态度,开始加强对海洋渔业社会的管制”,“干预政策日见细化并逐步完善”。19 世纪尤其是从清末新政以后,开始“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政策经验”,“海洋渔业政策多集中于对海洋秩序的控制与稳定”,从而开启向现代的转型。“总体而言,整个明清的海洋渔业政策从明朝初期开始密集出台,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在 1518 年后连续出现,直至明朝灭亡。清朝初建,其渔业政策的出台就远远超过明朝初年。经过 1698 年的短暂调整后,在 1698—1788 年这 90 年间,政府出台的渔业政策远远超过明清任何一个时期。1788—1838 年这 50 年间政策出台的频率再次达到仅次于 1728 年的高峰,自此之后,政府海洋渔业制度出台的数量与明初相同。整个政策频率的走向呈现倒‘U’字形。”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分析论证了推动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生成发展的诸多复杂因素,如地理环境、社会经济背景、文化传统、倭寇侵扰与海防压力、海洋渔业经济自身与腹地经济的变迁发展等;明清交替后则进一步变得更加多元化,如沿海贸易的繁荣与人口增长、沿海人口向海洋渔业领域转移的加快、过度捕捞的逐渐产生等;鸦片战争后又产生许多新的因素,如西方列强的入侵、海防的废弛、日本等国的渔侵、海盗的猖獗、沿海工业的现代化、西方政策经验的引进等等。如果说自明至清前中期,“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生成首先来自于其内生因素”,这些“内生因素孕育了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最初形态”,那么 19 世纪后,外生因素的影响日渐明显。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导致政策变化过程中的政策漂移与政策创新,最终形成了新的海洋渔业政策”。作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决定海洋渔业政策演进方向的根本因素是海洋渔业经济自身的发展,而由于海防压力的波动所造成的政策转向只是在特殊时期的特定政策行为,一旦这一外部因素消失



后,海洋政策仍旧会回到原有的演进轨道上去。”

此外,作者还进一步论证了海洋渔业政策、海洋渔业组织与海洋秩序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一,海洋渔业政策对海洋渔业经济、海洋渔业组织发展和海洋秩序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比如,“在浙江海洋渔业组织历次嬗变中,政府的规范和引导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浙江渔业行帮组织就是“浙江海洋渔业宽松政策引导下的产物,随着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变迁,行帮组织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其团体作业的生产方式也有相应的改变”。其二,海洋渔业组织对于国家维护海洋秩序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护浙江海洋渔业及维护海洋秩序的任务主要由民间渔业组织所承担”,“海军、政府与民间组织构筑了‘三位一体’的护渔体系,以求更好地维护海洋秩序。”例如,从1904年组建之初起,“江浙渔业公司的轮船就担负巡海护渔的重任”。以这种“官方支持下的民间经济组织为海洋护渔的组织与实施者,而国家海上力量则充当后备力量”,由此形成“现代护渔体系的雏形”。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作为一项颇具难度的研究,缺憾也是在所难免的。如能加强“浙江海洋渔业发展”部分的论述,或可更契合题旨。而在论证海洋渔业政策生成发展的诸多因素时,多提供一些实证数据,当可避免某些概念和逻辑推理的空泛,使论证更具说服力。

作为海洋和海交史研究的新生力量,期待白斌博士有更多新的成果面世。

王慕民

2014年12月22日于在水一方寓所

目 次

第一章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史料与研究成果	(2)
三、研究思路	(8)
第二章 地理、经济与政策变迁	(15)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浙江海洋渔业经济模式	(16)
一、浙江海洋地理特征与渔业经济	(16)
二、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与特征分析	(23)
第二节 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内容与演变路径	(31)
一、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政策内容框架	(32)
二、浙江海洋渔业政策演变路径分析	(40)
第三章 放任与重视：海洋渔业政策的独立演进	(48)
第一节 明代海洋政策与海洋渔业政策	(48)
一、明代海洋政策的出台及演进	(49)
二、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孕育与独立演进	(58)
第二节 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独立演进因素分析	(68)
一、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独立演进因素分析	(69)
二、明清鼎革时期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演进	(82)
第四章 管制与开放：海洋渔业政策的逐步务实	(94)
第一节 清代中期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变革	(95)
一、渔民政策	(95)
二、渔船政策	(101)
三、渔业区域政策	(118)
第二节 清代前中期海洋渔业政策演进因素分析	(127)
一、渔业政策的务实与开放	(128)



二、人口压力与海洋威胁	(136)
第五章 自由与干预：海洋渔业政策的现代转型	(148)
第一节 外部海洋渔业政策的引进与吸收	(149)
一、现代渔业公司的创立	(150)
二、机轮渔业生产的推广	(159)
三、渔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168)
第二节 传统海洋渔业政策的继承与转型	(178)
一、渔业合作组织的创办	(179)
二、渔业流通组织的建立	(187)
三、渔业金融组织的重组	(195)
第六章 政策、组织与海洋秩序	(203)
第一节 政策变迁与渔业组织	(204)
一、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	(205)
二、浙江海洋渔业公所	(210)
第二节 渔业组织与海洋秩序	(218)
一、晚清海洋渔业组织与护渔体系	(218)
二、民国海洋渔业组织与海洋秩序	(223)
第七章 结论	(235)
附录	
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政策大事记（1368—1937 年）	(245)
参考文献	(262)
后记	(271)

第一章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濒海大陆国家,在其漫漫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三者既独立发展,又交相呼应,三大文化的开拓者分别是牧民、农民和渔民。中国海洋渔业从沿海地区的原始人大规模采拾贝类开始,距今已有六七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渔业生产始终是海洋开发的最重要内容,是沿海人民赖以维生的重要经济活动。浙江作为沿海省份,有着悠久的海洋渔业历史,据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在距今7 000多年以前,当地沿海居民已能制造并驾驭性能良好的独木舟,到较深的近海水域中进行海洋捕捞活动”^①。在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同时,海洋渔业管理也逐渐被政府所重视。直到今天海洋渔业管理仍然是浙江省及地方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中国对海洋渔业的重视最早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开始,其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海洋渔业在东南沿海各省逐渐成熟。中国海岸线之长、渔业资源差异之大、沿海区域经济区别之显,警示着从事整体政策史研究的学者不能以偏概全。仅以东南浙、闽、粤三省而言,其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政府在对三省海洋渔业管理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浙江省的海洋渔业管理萌芽于唐宋时期,明清时期逐渐制度化。由于浙江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经济区,其海洋渔业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福建和广东,由此带来的就是政策差异和经济差别。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生成及其演变有何特点?与其他省份的区别何在?这是笔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现有浙江海洋渔业研究成果,多是从一个很短的时间段着手,研究浙江政策变化及海洋渔业政策对渔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无法解释浙江海洋

① 徐鸿儒主编:《中国海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渔业政策生成与演进路径的内在规律。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学家非常重视研究制度(或政策)对经济本身发展的影响及制度(或政策)本身的生成与变迁。现有制度经济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发展在制度(或政策)产生中的作用及制度演进中主客体的博弈关系。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是政策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地理、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也是各方政治经济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浙江海洋渔业政策是如何生成和演进的?影响政策生成与演进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在浙江海洋渔业政策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笔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2009年10月12日,随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经济学已经是第三次折桂诺贝尔奖。这再次验证了制度分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奥斯特罗姆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海洋渔业资源作为很难界定产权的公共资源,在制度上如何设计和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一直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这对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变化与渔业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海洋渔业政策在不同时期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哪些?其政策经验对当代国家与地方政府有哪些借鉴价值?这是笔者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将以上三个问题结合,以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生成与演变为主轴,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生成与演化理论,对浙江海洋渔业政策演变历史进行动态研究,以探寻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生成、演变的规律,为当代政府渔业经济决策提供历史借鉴。

二、史料与研究成果

涉及浙江海洋渔业政策及经济发展的史料分布特别零散,其中古代部分史料多散见于官方整理的《明实录》《清实录》、明清档案、地方志及笔记小说当中。明代佚名作者的《渔书》是为数不多的海洋渔业文献,其中辑录了各种水产品不同区域使用的渔船渔具。到近代,相关史料的分布除官方档案和地方志书外还有定期出版的报刊杂志,如民国时期的《政府

公报》《申报》《宁波民国日报》《水产月刊》等。另外，这一时期外国游人在浙江的见闻也可作为参考。

19 世纪末，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开启，知识界对海洋渔业的重视程度也慢慢提高，而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促使部分学者开始运用现代学术调查和分析方法来探讨浙江海洋渔业的现状。朱正元于 1899 年调查出版的《浙江沿海图说》^① 系统地列举了浙江沿海港口商渔船只的数量分布，同时还以西方非常科学的表格形式整理出各沿海岛屿渔民的分布及岛屿经济形态。该书是研究晚清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后，在晚清状元张謇的资助下，沈同芳于 1906 年编写的《中国渔业历史》^② 勾勒了中国渔业史发展的完整轮廓，其在渔业“学术史上的草创之功则是值得肯定的”^③。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近代浙江海洋渔业，特别是渔业经济与管理转型时期的史实，是另一部研究晚清浙江海洋渔业政策的重要参考文献。到民国时期，曾留学日本并在实业部任职的李士豪于 1936 年、1937 年先后出版了《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与《中国渔业史》^④ 两部书。对于民国时期浙江乃至中国海洋渔业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困境，该书都有详细的涉及。至此，1954 年张宝树在台湾出版《中国渔业》一书开始分省讨论沿海渔业经济发展状况，其涉及浙江的部分主要是海洋渔业资源的分布与生产状况^⑤。就大陆区域而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界才继续关注这一领域。1983 年，张震东和杨金森共同编著《中国海洋渔业简史》^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海洋渔业史的首部著作。在书中作者已经注意到不同区域渔业政策的不同，并按照省份将其分开论述，其对浙江渔业生产力、渔业政策和渔业组织已经展开系统研究，尤其是对清代浙江渔业组织的研究至今仍值得借鉴。1993

① [清] 朱正元：《浙江沿海图说》，上海聚珍版印，光绪己亥年（1899 年）版。

② [清] 沈同芳撰：《中国渔业历史》，载《万物类聚室类稿：甲编二种乙编二种外编一种》（铅印本），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1 年版。

③ 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 页。

④ 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李士豪、屈若皋著：《中国渔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海书店 1984 年的影印本。

⑤ 张宝树：《中国渔业》，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年版。

⑥ 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 年版。

年,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①从原始渔业、传统渔业以及现代渔业三个方面对中国渔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1995年日本学者中村治兵卫所著《中国渔业史研究》^②主要是对从唐朝到明朝这段时期中国渔业经济、渔业税收和渔业管理的论述。1998年,欧阳宗书著《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一书,把中国海洋渔业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填补了中国海洋渔业断代史研究的空白,对明清中国海洋渔业进行了更加细微的研究^③。其对明清中国海洋渔业政策尤其是有关船只的政策作了非常细致的分类。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作者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在长时段的渔业史研究中没有展开对渔业政策动态变化的论述。2004年,尹玲玲的《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一书对整个长江中下游淡水渔业和海洋渔业资源、市场和管理作了整体的分析,其中有关渔政法规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④。

除以上文献、著作外,专题研究浙江海洋渔业政策发展的论文与著作涉及金融、行会及制度规范等领域。伍员先生在《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一文中,对晚清民国时期浙江海洋渔业的生产过程、生产资本和金融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1930年以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体系主要包括鱼行、典当、钱庄和高利贷,金融资本在分享渔业经济利润的同时也支持了海洋渔业自身的发展。这篇文章是笔者目前检索到的论文里唯一一篇史学领域研究海洋渔业生产与销售过程中金融问题的文章^⑤。丁留宝在仔细阅读并分析1927—1937年上海渔业档案的基础上,指出民国时期上海已经成为江浙海洋渔业产品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因此在对明清以来,尤其是晚清之后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及政策变迁的研究中,必须考虑到上海作为浙江海产品销售市场和销售份额的重要性以及上海地区海洋渔业金融与政策

① 丛子明、李挺:《中国渔业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日]中村治兵卫:《中国渔业史的研究》,日本刀水书房,1995年版。

③ 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

⑤ 伍员:《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浙江金融,1984年第6期,第29—30页;伍员:《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续上期)》,浙江金融,1984年第7期,第29—31页。

变革对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①。基于此，本书在讨论近代浙江海洋渔业政策问题时，将时刻关注上海区域相关政策建设的变化及影响。就浙江海洋渔业行会问题，黄晓岩以浙江玉环渔会为例，在整理渔会档案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特别是1946—1949年战后玉环渔会组织的恢复与变化及其对当地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做了深入探讨，该文是研究中国海洋渔业组织的第一篇学术论文^②。对于渔业公所的地位，王文洪以民国时期浙江东沙渔港渔业公所状况为例，认为“公所的建立对组织和推动各地渔民到远离自己据点的渔场去生产、寄泊，调解渔场上出现的纠纷，并在交易过程中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③。另外，最新涉及浙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专著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执教于乔治城大学的Micah S. Muscolino在200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Fishing War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④。该书是在其硕博论文基础上修改，历时6年时间完成的。其间作者本人曾在舟山、上海从事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挖掘了当地的第一手资料。该书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舟山群岛海域海洋渔业的发展，着重于20世纪上半叶舟山海洋渔业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检视生态环境与人类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互动的复杂性。其具体内容以晚清民国时期舟山海域中日渔业纠纷、江浙渔业纠纷为例，探讨人类如何掌控舟山海域的渔业资源以及资源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规范与协调机制。其他涉及浙江海洋渔业的论文多为介绍性的文章。例如：1984年赵以忠对舟山渔业发展史的讨论^⑤；1997年吴树敬对古代浙江温州海洋渔业发展状况的简述^⑥。另外，随着20世纪80年代地方志书的编撰，浙江沿海各新编地方志中对当地海洋渔业发展多有

① 丁留宝：《统制·民生·现代化：上海鱼市场研究（1927—1937）》，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黄晓岩：《民国时期浙江沿海渔会组织研究——以玉环渔会为例》，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③ 王文洪：《东沙历史上的渔业公所》，中国海洋报，2008年1月15日第4版。

④ 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⑤ 赵以忠：《舟山渔业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04—114页。

⑥ 吴树敬：《温州古代海洋捕捞史略》，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第167—169页。

涉及。一些条件成熟的区域编撰或出版了专门的渔业志,如《舟山渔志》^①《镇海县渔业志》^②《苍南县海洋与渔业志》^③。

就海洋渔业政策研究方法而言,朱德坤和郑平胜利用1978—1982年浙江海洋水产研究所水文调查资料,分析浙江近海水温与海洋渔业生产的关系。结论指出:“浙江近海水温层化的长、消过程,对鲈、鲹、带鱼汛的汛期进展及鱼发、生产均有较密切的定性关系。”^④由此可知气候环境的变化对海洋资源种群与数量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陆杰华等^{⑤⑥}在修正系统模拟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选择投资规模、技术进步等变量进行了系统仿真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渔业资源限定条件下,投资规模对渔业生产的影响是有限的;而技术进步的影响则是十分显著的;同时,劳动力资源短缺也将会显现出来”。随后,他们在建立构建人口、消费与海洋渔业资源相关关系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动态分析了舟山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是如何影响其海洋渔业资源的。其研究表明:“影响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动因不仅包括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的变化,还要考虑到经济增长模式、市场价格、政策引导以及当地居民行为等因素。”对于资源变化与政策之间的关系,Micah S. Muscolino将环境科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对舟山渔业资源分配的研究中,指出在资源紧缺状况下,其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政策变革的影响。^⑦而对于资源紧缺所导致的渔业纠纷,Robert Pomeroy等人运用统计学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东南亚各国渔业纠纷,指出渔业共同管理是降低渔业纠纷的有效途径^⑧。在政府管理层面,丁留宝引入统制经济理论分析国民政府加强渔业干预的内在冲

① 《舟山渔志》编写组:《舟山渔志》,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宁波市镇海区水产局、宁波市北仑区水产局:《镇海县渔业志》,内部发行,1992年版。

③ 苍南县海洋与渔业局等:《苍南县海洋与渔业志》,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

④ 朱德坤,郑平胜:《浙江近海水温的层化现象及与渔业生产的关系》,《海洋科学》,1984年第3期,第15页。

⑤ 陆杰华、王广州、李建新等:《人口、消费、技术模式变化对我国海洋渔业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浙江舟山渔场为例》,《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3期,第1页。

⑥ 陆杰华、王广州、李建新等:《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对海洋渔业资源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舟山为例》,《人口学刊》,2004年第5期,第3页。

⑦ 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⑧ Robert Pomeroy, John Parks, Richard Pollnac, *Fish war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Marine Policy*, 2007, 31: 645-656.